

读《土地与歌》关于音地关系的思考

邓佩霞 任飞

江西科技师范大学

摘要：《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这本由乔建中教授编纂的书籍，主要探讨了音乐和地理之间联系的著作。加上“代序”的“我心中的‘信天游’”，全篇的文章一共是23篇。这本书它不只是一本简单的音乐学术论著的集合体，还是一本具有中国实践使用价值的田野调查实操著作。本文将简单的介绍一下乔建中先生的生平经历、以及从地理学、民俗学、历史学三大方面去阐述。

关键词：土地与歌；音乐地理学；民俗学；历史学；乔建中先生

【DOI】10.12252/j.issn.2096-627X.2023.12.136

《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是乔建中先生整理的关于音乐与地理之间关系的著作。加上“代序”——“我心中的‘信天游’”，全篇的文章一共是23篇。前10篇重点阐述了我国具有代表性的大型民歌，内容涵盖它们的种类、音乐特点、分布区域以及自然地理因素的影响。后13篇主要讲述的是我国大型具有代表性民歌的产生与中国传统音乐文化之间的联系。

这部著作不仅对中国传统音乐的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对民歌音乐研究来说也有具有举足轻重的分量。

《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是以文化地理学、历史学、语言学、民俗学等几个交叉视角进行分析论述，使民歌研究有了新的深度和跨度，使此领域研究有了新“增长点”，开启了“音乐地理学”的研究开端。学术界也有不少学者通过研读《土地与歌》这部书了解到，在一定条件下的地理环境对于民歌的形成、传播、发展、保存是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与此同时，不少学者们也对通过研读此书做了一些相关的思考与该方面的进一步研究探索。如王耀华先生的《脚踏实地 真诚执著——读乔建中〈土地与歌〉》、韩辉丽的《土地与歌：“花儿”与“少年”》、张振涛的《〈土地与歌〉·土地与人——音乐学家乔建中》、韩锺恩的《回馈给土地的歌——写在乔建中〈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修订版]出版之后》、欣芝的《把握中国传统音乐的命脉——读乔建中的〈土地与歌〉》等等。在相关的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到有的是对乔建中先生《土地与歌》这部书的总结的与归纳，有的则是在此书的基础上更深层次去挖掘民歌的价值。因此，《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这本书它不只是一本简单的音乐学术论著的集合体，还是一本具有中国实践使用价值的田野调查实操著作。它所具备的价值和引人思考的能力是无限的。

一、乔建中先生的生平经历

乔建中先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著名的音乐家，上承杨荫浏、黄翔鹏等老一辈传统音乐大家的学术传统，下启当代音乐学人的思想与智慧，是中国传统音乐研究的重要承接者与领军者。建中先生对于民族音乐学的贡献离不开他自身的文化积累与田野采风实践经历，而对于田野实践调研而言，离不开他自身的个人成长经历与工作环境。先生出生在榆林市，从地理角度来说榆林市位于陕西省最北部，东边隔着黄河与山西省两两相望，西边与甘肃、宁夏两省相邻，南边与延安市接壤，北边与内蒙古相连接。并且榆林有源远流长的历史，有着“小北京”的称号。天然的地理环境和多样化的文化交织为在民间音乐创造了优越的发展条件，能与各种音乐进行融洽的交流。乔先生也因此从小受榆林小曲、陕北说书、闹春秧歌等一些当地民间音乐的熏陶为的往后调研学习打下了坚实基础。后期先生的生活也是一波三折但是也可以说的“歪打正着”，先是通过自身考学学习系统音乐知识，后又受文革影响下放到中国京剧团整理老唱腔认识到了传统京剧魅力，再被下放分配到山东群省艺术馆时恰好又了解了当地的地方系音乐。这些实实在在的“主动”与“被动”的采风调研经历与不断对传统文化的学习积累构成他大半生采风之旅上的“长亭”与“短亭”。

二、以地理学为主要脉络

看过先生生平经历以及其他的书籍就会发现，先生十分注重实践，坚持通过田野采录，直接掌握第一手资料，并且在田野采录过程中，亲身感受有关音乐的社会文化背景及其传播、使用情况。为了记录地方民歌常进行实地考察，曾走过西口、下过四川、闯过关东、进过草原，外到山南海北，内到关西塞外。30年期间，他先后到山东、湖南、广西、广东、甘肃、青海、河南、河北、山西、陕西、西藏新疆、内蒙古、黑龙江、云南、贵州、福建、北京、天津、海南等省区的汉、蒙古、回、土、撒拉、东乡、保安、藏、苗、瑶、黎壮、纳西、鑫、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赫哲、么佬、毛

南、维吾尔诸民族聚居区作实地考察，成为从事田野调查最多的音乐学家之一。《土地与歌》就是他通过实地考察得来的优秀成果，将中国传统音乐与地理学相结合，是第一批开创中国音乐地理学研究的学者。特别是该著作中“我心中的信天游”（代序）、“汉族山歌研究”、“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花儿’曲令的民族属性及其他”、“‘花儿’研究第一书”、“《下四川》研究”、“山东民歌论”、“中国音乐文化分区的地理背景”，“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这几篇文章都讲到了着重强调了地理环境对于民歌产生、发展变化的影响。

如“汉族山歌研究”将山歌的分布情况分成“两方”“五区”。北方一区——黄河中上游区，南方四区——包括长江上、中、下游区及珠江中上游区。在“甘肃青海‘花儿会’采访报告”也将丹麻寺“花儿会”、莲花山“花儿会”、瞿县寺“花儿会”等“花儿会”的背景进行了直观印象地理因素分析。在“‘花儿’曲令的民族属性及其他”中，对于风格特色也是根据地理因素分成四个不同的“曲令群”，第一类为具有回（汉、东乡、保安）族特征的“花儿”曲令、第二类为撒拉族花儿曲令、第三类为土族花儿、第四类为汉族“花儿”曲令。“‘花儿’研究第一书”也是如此，对三陇地区的花儿是以人文地理角度“区域”来划分的三个区域。第一区域是河州和狄道一带，第二区域是西宁、湟源、巴燕戎、贵德带，第三区域是洮州、岷州一带。“《下四川》研究”也是以“四川”为主题的民歌，按照地理分布和数量分为第一分布区“半岛《跑四川》区”或“半岛分布区”、第二分布区“高原《下四川》区”或“高原分布区”、第三分布区“盆地《过四川》区”或“盆地分布区”、第四分布区“江湖平原《上四川》区”或“江湖分布”。“山东民歌论”同样根据自然地理分出了东部的半岛低山丘陵；西、北部的平原；中、南部的丘陵或山区三个大的地理单元，在此基础上又分鲁东区，鲁南区，鲁西北区和鲁中区四个不同的区域，在这些分布区内进一步分析流传着劳动号子、小调、秧歌、等七种不同体裁。下篇在“中国音乐文化分区的地理背景”也提到过地理环境的重要性，引用乔建中本人与苗晶老师出过书籍——《论汉族民歌近似色彩区的划分》的一句话进行了概括：“特定地理、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下来并进而发展生产的先决条件，也是产生和形成不同种族、不同地区的文化传统、文化面貌的重要基础。”最后介绍“音地关系探微——从民间音乐的分布作音乐地理学的一般探讨”这篇文章，可以说是将前几篇文章中有关于音乐与地理之间的联系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归纳。详细地阐述了中国民间音乐中

的地理因素与存在的三层关系，深层关系——是地理因素导致的民间音乐风格区、表层关系——是环境对体裁的“选择”、储存关系——是地理环境作为保护传统文化的自然屏障。

以上所述，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同时也是民歌为主的民间音乐发展依托。“多山、多水、多植被”的地理环境特征造就了我国民歌种类的丰富多样性，整体呈现出南多北少，东多西少的局面。而此时的山脉成了文化传播的障碍和壁垒，而江河水流则成了文化交流的通道和长河。因此，多山体环绕所形成的民歌闭环能使得民歌的最原始风貌得到更加完好保存；多水环绕区由于水系发达、人员流动大，所处当地民歌能接触更多的其他民间音乐，能在自身的基础上融合发展并创造更多新的乐种。这既是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也是所处的当地人们根据自身审美标准与价值取向所决定。所以说《土地与歌》是其有关“音—地—人关系”探讨所建构的中国传统音乐地理学的理论框架成果。

三、以民俗学为主要脉络

民俗是常民生活形态的真实反映，包括生活中食、衣、住、行、育、乐的内涵与形式，以及其间思想、行为、仪式、活动的记录与形成，都是民俗学探讨的主题。这种约定俗成的习惯与风俗，不仅是人们生活的提升与满足，更是民族生存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而民俗学从学术属性来说是一门兼具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性质的交叉学科，是一门针对风俗习惯、口承文学、传统技艺、生活文化及其思考模式进行研究，来阐明这些民俗现象在时空中流变意义的学科。乔先生的《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书中用到了民俗学中的口头民俗学（口传文学）、物质民俗学（常民生活）、宗教民俗学（民间信仰）和风俗民俗学四个主要研究对象，将音乐与民俗学进行相结合。具体如下：

首先，在“汉族山歌研究”中第一次明确地把地方民歌——巴渝竹枝称为山歌的是唐代诗人李益的一句诗“无奈孤舟夕，山歌闻竹枝。”运用民俗中的口头民俗学（口传文学）。有关“花儿会”起源于“社交”之说，神、人传授之说以及踏青之俗与“花儿会”等形成原因说法同样也是口头民俗学（口传文学）。

其次，像“花儿会”的会址选择在寺庙为中心，会期一般在六月与正月以及自身对歌形式；山东民歌的鲁东区蓬莱“烧纸调”、鲁南区的微山湖“端公腔”；壮族“三声部”民歌《欢悦》采访纪略中三声部“欢悦”的产生；雅俗新辨中有关雅与俗的含义。这些即运用了风俗民俗学（仪式庆典）也运用了宗教民俗学（民间信仰）。

最后,要说的是来参加丹麻寺花儿会的赴“会”者们,他们赴“会”时穿特定的服装服饰。如土族青年的穿着一般是小领、斜襟短褂和黑色坎肩;土族妇女的穿着主要是斜襟长袍、系彩带,并搭配特定的帽子以及二瞿县寺“花儿会”同样有相关的习俗规矩,如来听歌的人要自动准备一些冰糖(或水果糖)给你认可、感动的歌手,因为这些冰糖(或水果糖)象征纯洁与坦白。这些则是运用了物质民俗学(常民生活)。

因此,从某种层面来说中国传统音乐不仅仅是一种艺术形式,更是一种民俗文化的载体,承载着千百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情感交流。在民俗学的研究中,中国传统音乐也被视为一种社会交往的方式和工具。不论是在宗教仪式、婚丧嫁娶、节庆活动还是日常生活中,中国传统音乐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既是人们情感传达的媒介,也是社会生活的精神支柱,通过音乐的表演和传承,民俗文化才得以延续和弘扬。

所以,《土地与歌》这本书不仅把握了中国传统民族民间音乐在中国音乐史的主角,开启中国的音乐地理学。同时,还将民俗学和中国传统民间音乐相结合,为如何更好地运用音乐与民俗学结合的新视角来思考问题提供了思路。

四、以历史学为主要脉络

《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除了体现地理学、民俗学外还主要体现了以历史线为主要脉络的历史学。一部分是涉及传统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另一部分是传统音乐的自身收集、整理和分类。关于传统音乐与中国传统文化的联系,文中“《五更调》的渊源及其流传”、“时序体民歌与月令文化传统”都有提,在“两句体的旋律类型简论”中讲到两句体的历史渊源是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样式——“对联”和“挽联”。以及曲牌论中的曲牌从“非曲牌”时期、到“雏形期”、再到“成熟期”、最后到“嬗变期”的形成发展历史轨迹都有提到。并且对于曲牌性思维的历史成因,也从民族文化背景“远因”和中国音乐文化自身经历的历史实践“近因”来说明。其实在前半篇的“山东民歌论”中也有提过关于“山东”这个称呼的由来,是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齐鲁文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而关于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主要体现在“汉族传统音乐研究四十年”这一篇文章中,该文通过对传统音乐的收集整理发现民间歌谣的采录是从西周开始,期间代代相袭,数千年不曾中断。而对于民间歌曲的收集与整理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活动是发生在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主要是由当时延安地区的一大批新音乐工作者主导。对于建国四十年来的传统音乐采录、整理工作又归纳分为前中近三个时期,分别是

1949-1965 为前期、1966-1978 为中期、1979-1989 为近期。同样在“中国民族音乐十年”中也有体现,将80年代的音乐创作三大特色,创作大、中型作品热、“仿古乐舞”热、和“新技法”热。

因此,通过从历史发展脉络为主线进行的研读,从中可以看到中国传统音乐的历史早在几千年前的古代就有所体现,并且从音乐角度让我们更加深入了解到中国传统的价值观和哲学思想。中国传统音乐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解和传承。其历史性、文化性以及艺术性,使其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

综上所述,对于《土地与歌——传统音乐文化及其地理历史背景研究》这本书,乔先生深入探讨传统音乐文化与地理历史背景之间的关系。在书中,通过对不同地区的音乐类型、音乐传承及其地理环境的关联进行深深地研究,揭示了音乐与土地之间密不可分的联系。不同地域的音乐风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当地地理环境、气候条件、民族风情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地理历史背景则为音乐传承和发展提供了独特的土壤。同时也从民俗学和历史学角度进行阐述,将我们带入了一个全新的视角,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传统音乐文化的丰富内涵和深厚传承。传统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不仅承载着民俗学和地域文化的丰富内涵,更蕴含着世代传承的文化精神。它承载着人们对土地、生活、情感的表达,代代相传,成了凝结民族情感与智慧的宝贵财富。而对这些传统音乐文化的研究与传承,也正是我们弘扬民族文化、传承文明的责任和使命。最后用建中先生话来总结,“研究某一文化现象时,必须内’外’兼顾,即不仅注意该现象的内在结构,而且还要细心考察它的外部环境,特别是作文化学的研究,更应观照它的一系列外部因素。只有经过先外后内,由外而内的途径,我们才能透视该文化现象的本质所在。”

参考文献

- [1]余御鸿.妙谛圆融 风起云涌——乔建中学术研究的三重境界[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22(04):159-164.
- [2]张君仁,杨银波.托生命于传统 寄情怀于民间——写在《乔建中文集》出版发行之际[J].人民音乐,2023(08):77-81.
- [3]张振涛.《土地与歌》·土地与人——音乐学家乔建中[J].人民音乐,2008(09):4-11.
- [4]蔡际洲.乔建中与中国音乐地理学[J].交响(西安音乐学院学报),2015(01):22-30.
- [5]王耀华.脚踏实地 真诚执著——读乔建中《土地与歌》[J].人民音乐,1999(06):48-49.